

中国古代小说

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

赵景深

最近我看了朱星同志在《社会科学战线》第六、七、八期谈《金瓶梅》的《版本考》、《作者考》和《辨伪考》。觉得他参考了很多书，又访问了孙楷第、吴晓铃、黄肃秋、王利器、范宁等专家，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我特别赞同他对于《金瓶梅》的意义，有所阐发。他在《版本考》上说：“书中所写西门庆、潘金莲、应伯爵等恶霸、淫妇、马屁精等坏人，各地都有，人民切齿痛恨。此书已成为照妖镜，人民也爱看。”这就说得很好。不过他说《金瓶梅》是王世贞写的，我却不敢苟同。我认为王世贞仅只是后七子的领袖，他是主张“文必秦汉”，“诗必盛唐”的摹仿者。他喜欢骈俪派的戏曲，反对白描派的戏曲。他是标准的复古派。他的《艺苑卮言》中论曲的四十一条（有辑本《王氏曲藻》），大部分是抄书的，如《中原音韵》、《太和正音谱》等就抄了很多。

一、王世贞的文艺思想

《金瓶梅》是小说，当然不是戏曲。但王世贞的戏曲主张代表他的文艺思想，所以我要谈谈。尽管他自己的意见不多，影响却很大。对于这四十一条，我想谈以下两点：

1. 骈俪与本色之争。他主张骈俪，反对本色。这从他对于《西厢记》的看法，可以辨别出来。《西厢记》的长处在于本色，但他却认为《西厢记》当中骈俪的词句最好。他一共举出《西厢记》里面有十五个警句，骈俪中最语、骈俪中情语，都有五条，骈俪中混语有四条，但单语却只有一条。这真是买了宝椟却把宝椟里的珍珠还给人家了。别的不举，只举他所喜欢的骈俪中情语两条，就可以知道：“哭声似莺啭乔林，泪珠儿似露滴花梢”。“香消了六朝金粉，瘦减了三楚精神”。另外，他称赞所谓关汉卿的《续西厢》（实际是王实甫《西厢记》第五本）当中的警句云：“线脱珍珠，泪湿香罗袖；杨柳眉颦，人比黄花瘦”。这三条所谓警句，究竟有什么好处呢？说莺莺掉泪，应该从情感上来描写，单只用比喻，把眼泪比做什么“露滴花梢”、“线脱珍珠”，又有什么值得称赞之处呢？说莺莺瘦了，又何必举“六朝金粉”、“三楚精神”来描写呢？

他既然喜爱骈俪，当然对于骈俪的作家要大捧其场的。他有一段话说：“吾吴中以南曲名者……郑山人若庸……郑所作《玉玦记》最佳，它未称是。《明珠记》即《无双传》，陆天池采所成者，乃兄俊明给事助之，亦未尽善。张伯起《红佛记》洁而俊，失在轻弱。梁伯龙《吴

越春秋》，满而妥，间流冗长”。从这段话来看，他对郑若庸的《玉玦记》，陆采的《明珠记》，张凤翼的《红拂记》以及梁辰鱼的《浣纱记》，尽管也有批评的地方，却是褒多于贬，他是把这四部作品当作吴中南曲名家著作的代表。

王世贞对于《琵琶记》的看法，认为这一部戏曲，所以“冠绝诸剧”，是在于“琢句之工，使事之美”。他特别称赞《琵琶记》中“万里长空”这一套“赏月”的曲子。这种看法，是同他对于《西厢记》的看法完全一样的。我们知道《琵琶记》的曲子有骈俪的部分，也有本色的部分，但前者少于后者。蔡伯喈在牛府里的一些戏大半是骈俪的，如“赏荷”、“赏月”；赵五娘的一些戏大都是本色的，如“吃糠”、“尝药”、“筑坟”、“写真”等。王世贞欣赏前一部分，徐文长《南词叙录》却欣赏后一部分，这就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的高下。另外王世贞批评《拜月亭》“无词家大学问”。凌濛初的《谭曲杂札》对王世贞对《琵琶》、《拜月》的看法也有一段反对的话语，“元美贲《拜月》以无词家大学问，正谓其无吴中一种恶套耳！……安得不击节于‘新篁池阁’、‘长空万里’二曲，而谓其在《拜月》上哉！”上面所引的“新篁池阁”，正是《琵琶记》“赏荷”中主曲的第一句。

我们认为，骈俪派的戏曲，堆砌典故，实在不足为训。例如，丘濬的《香囊记》第九出，接连把许多马的名字夸了一番，好象开马行一般；又如梅鼎祚的《玉合记》第二十一出，把许多船名夸了一番，好象在开船舶展览会，象这样似乎“分类辞源”的玩意儿，实在是非常可笑的，谈不上什么文学艺术性。

这里附带要谈一点，王世贞《曲藻》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韩苑洛（邦奇）作乃弟邦靖行状，末云：‘恨无才如司马子长、关汉卿者以传其行’。北人粗野乃尔，然亦自有致”。王世贞所说的“粗野”重点不是指的司马迁，他是指的关汉卿。我想他的意思就是看不起关汉卿，认为韩苑洛不应该称赞关汉卿。当然，关汉卿的反抗精神，王世贞是不会注意到的。恐怕他还是从骈俪和本色来看的。他只看出关汉卿所写的曲子，大都近于大白话，这样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，居然用在堂皇的行状里，当然王世贞要认为是粗野了。

2. 草率与严肃之别。《曲藻》全文四十一条中有不少是从别的书里东拼西凑地抄下来的。如“周德清云”、“作词十法”、“马致远百岁光阴”、“元人曲”等条，显然是从周德清《中原音韵》里抄来的。又如“涵虚子论元词一百八十七人”这很长的一段，显然是从朱权的《太和正音谱》里抄来的。这就看出他著书的草率。

最可笑的，是他写的下面的一段话“张伯起《红拂记》一佳句云，‘爱它风雪耐它寒’，不知为朱希真词也。其起句云：‘检尽历头冬又残，爱它风雪耐它寒。拖条竹杖家家酒，上个篮舆处处山’。亦自潇洒。”实际上《红拂记》里并没有这四句话。徐复祚在《三家村老曲谈》里谈起，有人问起张凤翼自己，“伯起笑曰：‘王大自看朱希真《红拂》耳，似未尝看张伯起《红拂》也。’”另外，《曲藻》里有一条“王泮陂所为[折桂令]云”，其实，王九思所写的是[水仙子]，并不是[折桂令]。由于《曲藻》里有以上这些缺点，所以我说王世贞写《曲藻》的态度是不严肃的。

上面所写的虽然是王世贞对于戏曲的看法，和他抄书的不严肃的态度，但他对于诗文的眼光应当也是一样；推而广之，对于小说的看法，也应该是贯穿他的文学主张的。他的主张是：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。所谓秦汉文，大概是指秦汉的骈体文；所谓盛唐诗，当然基本上是最好的，但他只是摹仿，那就是假古董了。另外，虽然他也重视李白、杜甫，恐怕也是最喜欢杜甫的律诗，他对于李白的古诗未必喜欢，也是喜欢李白的骈俪的句子。即使他也喜欢

李白的古诗，但他于晚唐一些进步的诗是从来没有说过喜欢的。同样，他对于《金瓶梅词话》这类的小说，在他的《艺苑卮言》里是从来没有提到的。因为《金瓶梅》应该不是道貌岸然的人所写的，而是那些几乎沦为艺人之类的人所写的。他们尽管在小说里也写过一些骈偶的赞语，但这些赞语却与正式的骈体的赋不同，是一种近于白话的骈俪文。因此，我敢断言，《金瓶梅》绝对不是王世贞写的。在《弇州四部稿》里虽然特列了小说一目，那只是指传奇文，与白话小说无关。

二、王世贞没有写过《金瓶梅》

朱星同志谈沈德符《野获编》第二十五卷《金瓶梅》的一段记事，谈得很好。他推测鲁迅所说的庚戌年的版本是有道理的。这庚戌年就是明代万历三十八年。因为沈德符说他丙午年遇见袁中郎，问他有没有见过《金瓶梅》全帙本？袁中郎说他见过几卷，没有看到全本。这丙午年就是1606年，也就是万历三十四年。接着《野获编》又说，“又三年”，袁中郎已经有了这部书。那么从丙午年算起，过了三年，应该是庚戌年，也就是万历三十八年。所以我认为，朱星同志推测鲁迅所说的庚戌年版本是合情合理的。但是朱星同志先有一个框框，认为王世贞是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他写的《金瓶梅》是非常干净的，绝对不会有淫秽的话，又硬把《金瓶梅》的所谓王世贞原本再提前二十年，想把这书的出版期提前到与王世贞卒年1590年相近的时间，这就未免太随便，一点根据也没有了。但就按他所提前二十年的说法来看也还是1590年，王世贞也已死于同年了。他苦心孤诣地解释“坏人心术”这四个字是从《西湖游览志余》谈《水浒传》里来的，用这样的话，来说《金瓶梅》没有淫秽的地方。但是，沈德符《野获编》这段话的原文四个短句是这样说的：“坏人心术，他日阎罗究诘，何词以对？吾岂以刀推博泥犁哉？”这四句话的意思，就是说《金瓶梅》是坏人心术的书，将来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到地狱里去，阎罗王问起你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，我又拿什么话来对答呢？我难道愿意拿刻书的刀来换地狱里的泥犁吗？“泥犁”，就是把作者推到泥土里，拿他的身体来耕。这岂不是明显地说《金瓶梅》是一部淫秽的书吗？朱星同志为什么要断章取义，只说“坏人心术”，后面三句就不引了呢？我们谈《金瓶梅》的版本，不能随便乱说，硬派王世贞在二十年前有一个万历十八年的版本。其实，孙楷第初版本的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卷四就已经著录过《金瓶梅》他所见过的最早的版本。他是这样说的：“日本京都帝大藏明本。大型。书名《金瓶梅词话》，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四字，疑是隆、万间刊本”。隆庆(1567—1572)比万历元年还要早六年。

《金瓶梅词话》虽然有丁巳年的序，丁巳年虽是万历四十五年，比较迟，但是《金瓶梅词话》在这以前还有更早的本子。根据日本所出的《金瓶梅词话》例言第一、二条所说：“一、吾邦所传明刊《金瓶梅词话》之完全者有两部。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所藏本与德山毛利氏栖息堂所藏本者是也。二、两部与北京图书馆所藏本同版。但仅第五回末叶异版。今以慈眼堂所藏本认为初版。附栖息堂所藏本书影于第一卷末。”可见同一系统的还有毛利家和慈眼堂所藏的版本。这两种版本都比丁巳年序的本子要早。根据朱星同志自己在《社会科学战线》第六本上所说，有这样一段：“我曾为此事(按：即《金瓶梅》版本事)去访问孙楷第先生。孙说：国内见到此书版本之多无过于我(这是事实)，我只知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乙巳年本，未听说过有庚戌年本。”乙巳版本就是万历三十三年即1605年版本。这版本就比朱星同志所假设的庚戌年(1610)还要早五年。

兰陵这地名当然有两处：一是山东峄县，一是“武进”古名，即苏州邻县。但《金瓶梅词话》的作者兰陵笑笑生这个兰陵绝对是山东峄县，而不是武进古地名的兰陵，因为这部书绝大部分是山东峄县话，而不是常州话。

朱星同志对于《金瓶梅》的方言问题说得不科学，大多出于想象。他说：“王世贞从小就随他父亲王抒寓居北京，十九岁在北京会试殿试中进士，一定会说一口北京话。”据我所知，说方言不是很容易的。有些人会，有些人不会，怎能说王世贞一定会说一口北京话呢？北京话卷舌多，我可以学习不少方言，但要说一口北京话，我也没有这个本领。我只能说普通话。在北京，北京人却说：“你的南方话倒好懂。”朱星同志又说：“王做过三年的山东青州兵备副使，也会说些山东话。”这也是想当然。王世贞那样板方的人，他到山东三年，就会说些山东话吗？朱星同志又说：“在山东做官，一定使用些当地的婢仆。他写潘金莲、春梅、吴月娘、孙雪娥、宋惠娘等咀里的市井妇女骂人脏语，一定是从本地婢仆那里记录下来的。”朱星同志连用两个“一定”，也是主观太强。倘改为“大约”，那就会好得多。朱星同志这三条是最重要的，都说得不科学。其他第四到第九条都不重要，倒是写得比较客观，没有“一定”这一类的词语。

三、《金瓶梅词话》是民间的集体写作

《金瓶梅》究竟是谁作的，现在我把我自己的意见写在下面：

明末张岱写过一本《陶庵梦忆》，他这书中有一篇《不系园》。其中有这样几句话：“甲戌……杨与民弹三弦子，罗三唱曲，陆九吹箫。与民复出寸许界尺，据小梧，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，使人绝倒。”杨与民在小梧桐树下，用此调说金瓶梅一剧，是甲戌十月间的事，可能是崇祯七年，即1634年。当然，这件事比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出现迟得多。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就是说崇祯七年曾经有过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的事情。这里所谓的剧，即是一个人用一寸多的界尺来说的，当然只能说是曲艺，用的是北曲的调子。这里剧字的用意，是由于过去的人对剧和曲艺不加区别。我想，杨与民所说的，可能就是象西厢记诸宫调那样的曲艺。也就是说，这种曲艺不是杨与民创始的。倘若是杨与民创始的，张岱就要把这层意思写在《不系园》里面。我想，这种金瓶梅诸宫调可能是相传很久的著作，应该是民间无名氏的创作。

对于《金瓶梅词话》，我曾在《文物》1972年11月写过一篇《嘉定说唱词话的新发现》。我在这篇文章里说：“以前戏曲史工作者不大能够辨别什么是真正的‘词话’。象《金瓶梅词话》和宋人词话，其实都不是真正的词话，当时只有《大唐秦王词话》，才是真正的说唱词话。宋人词话，只是藏书家胡乱定的名称，实际上只是话本小说。至于《金瓶梅词话》，可能很早就有真正的《金瓶梅词话》。大约今本《金瓶梅词话》还保留着几小段真正的说唱词话，也就是有几小段尾巴没有割掉，一般明清小说常夹有诗词和骈文，每每在前面加上‘但见’、‘有诗为证’、‘且听我道来’这类的话。这种诗词和骈文的内容，一般只是描写或称赞，故事并没有前进一步，去掉也不要紧。但真正的说唱词话，却是一面故事在前进，一面写出血肉相关的情节。倘若去掉这些真正的词话，故事就连接不起来了。”我不知道我上面所讲的话是否把我的意思说清楚了。我想，《金瓶梅词话》以前，应该有一本金瓶梅说唱词话。后来却把这一部金瓶梅说唱词话改写为《金瓶梅词话》，只不过是保留了词话的名称，实际上只是普通的小说。但这里面却保留了几条没有割去的尾巴。冯沅君的《古剧说汇》曾注意到这一点，并且把

例子写出来。这就是《古剧说汇》里的《金瓶梅词话中的戏曲史料》。这一篇第二节“小说蜕变的遗迹”，见1956年作家出版社的重订新版本的183—185面。她用的是上海杂志公司所出的《中国文学珍本丛书》本，这两个例子见卷二面216和卷三面323—324。其他各例的页码也都是《中国文学珍本丛书》本。她说：

读《金瓶梅词话》时，最能使我们感到奇特而注意的，是书中人常常以韵语，尤其是曲，来代替普通的语言。如：

且说老虔婆见西门庆打的不象模样，不慌不忙拄拐而出，说了几句闲话。西门庆心中越怒起来，指着骂道：有[满庭芳]为证：“虔婆你不良。迎新送旧，靠色为娼，巧言词将咱诳，说短论长。我在你家使够有黄金千两，怎禁卖狗悬羊！我骂你句真仗俩，媚人狐党，衡一味假心肠！”虔婆亦答道：“官人听知。你若不来，我接下别的。一家人指望他为活计，吃饭穿衣，全凭他供柴爨米。没来由暴叫如雷。你怪俺全无意，不思量自己，不是你凭媒娶的妻。”西门庆听了，心中越怒，险些儿不曾把李妈妈打起来。

这便是以曲代言的一例，此外为卷一，面七十四；卷六，面七〇二，面七〇六；卷八，面一千〇五十七；卷九，面一千〇八十六，面一千〇九十八，面一千一百，面一千一百十三，面一千一百二十七，面一千一百五十七，面一千一百六十一，面一千一百六十四，面一千一百八十八，面一千二百〇六；都有这类例子。至于以其他韵语（也可以说是诗）代言的虽不甚多，但其中颇有得长的。如：

月娘道：“姥姥，生受你。怎的这咱才来。”蔡老娘道：“你老人家听我告诉：我做老娘姓蔡，两只脚儿能快。身穿怪绿乔红，各样鬃髻歪戴，嵌丝环子鲜明，闪黄手帕符（胡）擦。入门利市花红，生下就要管待。不拘贵宅娇娘，那管皇亲国太。教他任意端详，被他褪衣刮划。横生就用刀割，难产须将拳揣。不管脐带胞衣，着忙用手撕坏。活时来洗三朝，死了走的偏快。因此主顾偏多，请的时常不在。”

这些以韵语代语言的例子都应与《蒋淑真刎颈鸳鸯会》中的十篇商调《醋葫芦》有同样的功用或来源，虽然书中并无“奉劳歌伴，先听格律，后听芜词”和“奉劳歌伴，再和前声”等辞句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代言语的韵语都是以供“说话”时歌唱的，至少也是这种体例的遗迹。不然的话，一个人在骂架的时候居然会骂出一支曲子来，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吗？

以上冯沅君同志的遗著说得非常好；她除了举出两个例以外，还另外举了十四个例，可见韵语代替普通的语言是很多的。不过，她没有明说在《金瓶梅词话》以前的原著唱本，也就是《金瓶梅说唱词话》或《金瓶梅诸宫调》。

今本《金瓶梅词话》，曾经引用了《雍熙乐府》中的套数和杂剧二十套。我把这些套数都写在下面：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[梁州序]27 | 向晚来雨过南轩 |
| [朝元歌]36 | 花边柳边 |
| [斗鹤鹑]41 | 翡翠窗纱(《两世姻缘》第三折13:60) |
| [新水令]42 | 凤城佳节赏元宵(《灯词》11:3) |
| 南曲43 | 繁花满月开 |
| [醉花阴]46 | 雪月风花共裁剪(《思忆》1:20) |
| [好事近]46 | 东野翠烟消(南戏子母冤家) |
| [下山虎]46 | 中秋将至 |

- [伊州三台令]52 思量你好辜恩(南曲怨别)
- [花药栏]52 新绿池边(《送别》2:37)
- [新水令]55 小园昨夜放红梅
- [一枝花]61 紫陌红径(《失约》16:11)
- [端正好]70 享富贵受皇恩(《武臣皇福》3:2)
- [端正好]71 水晶宫鲛绡帐(《风云会》第三折2:3)
- [新水令]72 翠帘深小
- [集贤宾]73 忆吹箫玉人何处也(陈铎《秋怀》14:9)
- [玉交枝]73 彤云密布
- [宜春令]74 第一来为压惊
- [青衲袄]77 想多娇情性几标(《别思重会》9:78)
- [粉蝶儿]93 九腊深冬雪漫天

此外仅引唱了一套云云，没有录全曲的，不计。(凡三十种三十三见)

《雍熙乐府》是嘉靖丙寅年即嘉靖四十五年(1566)写的序，这个年代比《金瓶梅词话》的万历四十五年出版日期早五十一年。上表的号码指的是《金瓶梅词话》的回数，例如[梁州序]27就是《金瓶梅词话》27回，“向晚来雨过南轩”就是[梁州序]的第一句。其他类推。《两世姻缘》和《风云会》都是元杂剧，《子母冤家》是南戏，这些较古的曲子都不去说它了。较近的陈铎，是嘉靖年间的人。《武臣皇福》这一套，看来也是嘉靖及其以前的口气。《武臣皇福》下面所注的“3:2”，意思就是第3册，第2页，其他类推。总之，金瓶梅这一故事产生的年代，最早应该是嘉靖年间。我想，首先应该有金瓶梅说唱词话，性质就是金瓶梅诸宫调。(万历本《金瓶梅词话》。以后，当然有根据这个本子改编的《金瓶梅传奇》，大约是万历以后所编的。还有子弟书《得钞傲妻》之类，也都不去说它了。)

据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《东洋文化》58号戏曲小说特集尾上兼英的《成化说唱词话》试论(一)谈到：“现在潘开沛氏提出：《金瓶梅词话》是下层的知识分子、胥吏的集体创作。(见《光明日报》副刊《文学遗产》18期，《明清小说研究论文集》所收)我同意他的看法，所以我说《金瓶梅词话》是民间的集体创作。由于作者是胥吏或失意的文人，所以有的句子比较差。关于清代的张竹坡本，只是清代文人的改写本，其中并没有明代人原作的成份在内。

从《金瓶梅词话》每回不讲对仗看来，可能象《三国演义》那样，嘉靖及其以后年间的真正的《金瓶梅词话》回数应该是两百回，即比后来的《金瓶梅词话》多一倍。今本《金瓶梅词话》回目对偶不工整，正说明此书可能是从真正的《金瓶梅词话》两回合并一回而来的，决不像朱星同志所想是什么幼稚或不通的表现。

《小学生智力发展初探》即将出版

(仁可)

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《小学生智力发展初探》一书，汇集了上海市师范院校教育学、心理学教师和小学特级教师、优秀教师在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科学常识等学科教学中，怎样激发学生兴趣，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观察力、想象力、思维力，让学生多种感官并用，提高学习效果，以及训练学生自学等方面所取得的可贵经验。

该书文笔生动，饶有趣味，并附有插图六十幅，是有关发展智力、能力的最新参考资料，它的出版，将受到小学教师和师范院校师生的欢迎。估计明年四月可与广大读者见面。